



梁信

万能与万恶

花城出版社



梁信

万能与万恶

万 能 与 万 恶

梁 信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• 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湛 江 人 民 印 刷 总 厂 印 刷

850×1163毫米 32开本 9.125印张 1插页 195,000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2,000册

书号 10261·627 定价 1.55元

前 言

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同志，来广州参加出版会议。蒙他来看我，促膝谈心，他提议由我自选一部散文集和中短篇小说集。理由是：他看过我的一两篇中短篇，觉得“有特色”（这自然出于他对我的错爱）。

人总是愿听顺耳之言，而且他又是一位老大哥。于是我便随口答曰：“我的散文太少，质量也差，中短篇也许凑合……”

一言既出，心里就总惦着有这么回事，好象又欠了读者一笔“债”。但认真想想，“自选”集子，颇不易。三十年来，我主要是在电影文学的坎坷路上奔波。虽然也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、发表过一、二十篇中短篇小说，但自知浅薄，包括由出版社选编的《梁信电影剧作选》，我以为其中也有平庸之作，故小说从未想成集。此次一着手自选，便踟蹰了！由出版社选编，尚可聊以自慰：是编辑看中的，并非我凑数。自选，则好比自己是医生给别人开处方，和我开药店，你拿处方来我给药，那责任感很不一样。

怀着这样一个责任感，自定了录选条件：一，题材不能雷同；二，有趣、有益；三，尽可能选择描写青少年生活的；四，在样式上有些区别的。

根据以上的自定标准，翻阅旧作，左右甄别，十年动乱前的作品，虽也有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、译成外文的，但自我感觉都欠佳。为什么？说来话长，不能多占读者时间了。

因此，几经衡量，只留这么四篇，都是打倒“四人帮”后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定稿、发表的。

第一篇《一个“编剧”的遭遇》，是一九八〇年十月发表在《羊城晚报》上的短篇。发表时的标题是《我写电影剧本的经历》。内容是写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。虽是小说，却糅进了杂文笔法，算是一次学习、一种尝试。

第二篇《姐儿俩》，一九八〇年一月发表在《花城》四期上。内容是写一双孪生姐妹，在人生道路上三十年“分道扬镳”、令人心寒齿冷的变化。完全采用了传统的、有头有尾的写法。但在剪裁上，是下了一些笨功夫的。可算是长篇浓缩成短篇的一类作品。

第三篇《呼啸的马刀》，原是我的长篇小说《龙虎风云记》的序篇。这部长篇于一九七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今年准备再版。再版前，征得出版社的同意，将序篇抽出。理由是：序篇与整部长篇游离。这弊病在七八年出版前，我同出版社也都明白看出，但双方都舍不得割爱。现在下决心把它割出来，使其独立成章。这算是我献给少年儿童的一个小小礼物。它采用了电影文学剧本的一些手法，可算另一种浓缩办法。

第四篇《万能与万恶》，发表在《特区文学》第三期上。这刊物是随着广东省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而创办的。内地各省大约还很少读到它。小说样式是我杜撰的：拟科学惊险样式。内容虽是写金钱万能与金钱万恶，主旨还是集中笔墨写华侨及其

亲人们的爱国主义——那一片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。

以上四篇小说，从主观上来讲，我是认真按照自定四条标准选录的。但到底效果如何，请广大读者指教。

几句絮语，算是为读者当一个阅读向导。

谢谢。

梁 信

一九八三、四、十一，广州

目 录

前言	1
一个“编剧”的遭遇	1
姐儿俩	12
呼啸的马刀	49
万能与万恶	149

一个“编剧”的遭遇

我三十岁不到就秃顶了。秃得可以媲美一面天马葡萄镜：屋里一抬头，那头皮即反映出天花板上——群群苍蝇；人前一低头，就可以照出各种人物的嘴脸。因此，我们小学校的“预言家”打保票说：象“南瓜”这样的穷“老教”，下辈子也别想摸到个老婆！

敝姓“南”，不假；可名字並不叫“瓜”。之所以然，大约我的脑袋和性格，都有点象南瓜。前者是形似，后者取其面糊，神似也。我以为：未尝不可。

“预言家”（此人名叫余言佳）这次所言未中：我到三十而立之秋，居然“摸到个老婆”！其实我没有偷摸，也並非姑娘送上门。总之我说不清。开始是用眼睛瞅（无师自通），后来我拉拉她的手，后来……（从略）。总之——这“总之”是我的口头语——门当户对。我穷，她也穷。我是小学教员，她也是。我丑……她倒不丑。余言佳对于我们的配偶评之曰：

“武大郎玩夜猫子——什么人配什么鸟！”对这谈话，我以为：未尝不可。

我们的婚后生活，我自觉良好：清贫、和睦、知疼知爱，安安静静。有了个小女孩后，我觉得她象个小肉螺丝，把我和爱

人伍洁清的两颗心，更拧紧了。所以孩子的乳名叫“小螺”。

实际上我和伍洁清的性格並不投合。我对一切事都一笑置之：未尝不可。她是个忧郁型（不知有此一说否）。但她对我们这个家，是这样爱！她常说：社会上的冷眼，学校里的累，一回家，万虑皆空。

我们也不是和尚。“反右”啦，“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”啦，也都把我们穷整了一通。但因油水太少：“当个屁把他们放了吧！”总之，我们在穷乡僻壤，尽微薄之力，用心教孩子。转眼乎，二十有二年矣！

时光到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之后，好久才知道林彪事件。此信息一传至敝校，校长暴病，余言佳抽风。我还好，一切正常。贱内和小女，也无异常现象。家里只多了一桩新鲜事物：我和洁清换班到街头看报纸。又经余言佳在抽风之余指点我，说：看报看风：梁效池恒。一言管百年，一字千钧重。

我足足用了两个月，精读“梁效池恒”的大文。我明白了：咱中国的一切毛病（我冒死说，是有毛病的），都是林彪一人干的。林彪一死，一了百了，从此中国人要比宇宙间任何人都幸福！您就等着过好日子吧，好得叫你腻烦！

这当然是由于我的性格，曲解了“两报一刊”的宣传。因为那时仍旧起誓发愿要大搞阶级斗争。但又一想：八亿人口不斗行吗？很有道理。中国只有越斗越富。搞生产，大概是越搞越修。而修正主义，还不如没裤子穿。

以上废话不废：您会明白我是这样不识时务，不懂政治，在七一年底居然写了一部电影剧本。不久，我就被这部电影剧本逼得微笑、大笑加狂笑，差点没上吊！妻子洁清因这剧本得了一种病：无论谁在门前大声叫我的名字，她立刻头痛起

来，继之上吐下泻。十三岁的女儿小螺，到现在不敢看电影。有时忍不住，偶尔看一场，回家一夜做噩梦！——以上情况自然是我发昏前看见的，发昏后，就不知情况如何了。

总之，林彪死时，我尚健康，似乎更乐观了。然而学校仍无事可干。教室，象经过激烈巷战之后，弹痕累累，瓦砾片片。教员脑袋皮层以上所剃的阴阳头，因新陈代谢，早已长齐。可“老教”们破碎的心灵，却无神仙缝补。想找蒲松龄同志再请陆判来，蒲老又在几百年前作古了……

我挑上一担干柴，去找我的老师的老师，用老话当称师爷。

我的师爷，是一位老“老教”，与世纪同龄，当年七十二岁矣！我请教他，他也没辙。他只能热情地用我送去的柴，烧一顿饭留我吃。

我以为，后来我“差点没上吊”，都和这顿饭有内在联系。

老人家几杯水酒进胃之后，谈到他一九一八年，十八岁，怎样受徐特立先生之感召，回敝县办起了第一座实验两级小学。那时，他是校长、教员、校役三位一体。这学校，一直支持到一九六七年，因他彻底被打倒而彻底关门。

“五十年间，我桃李满天下！”他老人家笑起来，笑得很正常。又说：“而今，在中央当部长的，三位；在部队当将军的，十一位，——我的学生！”他又大笑起来（笑得很正常）。

“几月前，有位学生，给我寄了几百块钱来——是几百呀？小猫！”他的夫人姓茅，此为爱称。“你也没看清吧。反正：原封退还。附了一纸大八行，曰：‘尔等重我者，清白二字耳。苟舍清白，不劳而获，所重我何？’嘿嘿，如今一顶大帽：牛鬼

蛇神。两袖清风：笑看天下桃李。人生此复何求！？”

我的剧本，写的就是他。他在一九一八年能白手办学校，这不是很可鼓舞后来人吗？——倒霉也在这一念之差。

用了两个月时间，剧本写完了，抄了一遍，剧名《赤子心》。寄给了W市S电影制片厂。

三年过去了，没回信。我以为，制片厂剧本多，看三年也未尝不可。果然，七五年春末，从S制片厂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函！说了许多优点之后，落实到“大作基础颇佳。希即来我厂修改。”

另一封给我请创作假的公函，同时到达县文教局。待文教局的正式公函下达我们的小学校后，立刻引起一场诚惶诚恐的反应。连“敝家祖当过水师军门”，老婆又是“省嫂”（因此婆系省城产，故名）的余言佳，一时也不知如何应付这样的突然事变！据说，他彻夜未眠，天亮前断然决定：派“省嫂”立刻出发，去省城找她的干妈，外加他表姐夫的小舅子，紧急制定战略战术！

火车跨越两个省，到了W市，我找到制片厂。编辑小石，热情安排我的住处：并说“编辑部的同志还要看看本子。你休息两天……”

我到哪儿去“休息”呢？只有象傻瓜似的望着，心里空空洞洞的。想唱唱山歌，又怕惊动四邻。

几天后，我被小石领到编辑部，见了七、八位同志，有一位是“组稿组长”。他们对我都很客气，甚至流露些怜悯之情。

于是组长说了“统一意见”，于是大家“补充一点”，我只是挤笑着，记笔记，样子很象犯了错误。

提完意见后，组长问我：“老南同志有什么说说吧。”我一想：没什么。我如实答道：“我没什么……”他们有点失望。但还是客客气气让我回去“再想想”。

回到宿舍，我想了再想：平心而论，人家都是好人，对我都抱着善意。而且这次所提的意见，多属于“表现手法”、

“结构上的缺点”之类。因此小石特意给我借来几本书，讲了不少“视觉艺术”的常识；并提议要我“多看电影，有意识地多读几本著名编剧的剧本”。

看电影，读名著，当然是人生的享受。可除了厂内放的电影外，到影院看，就得买票。每场一角五，近处走着去，远处还要两角车钱——我囊中惭愧呀！来时洁清计划我在此呆两个月，硬从家里挤出四十元钱！我和她一个月薪金的总和才六十元，还要赡养乡下的老人，五口人吃饭……哎哟哟！说这些不革命的话干什么？报上不是谆谆教导我们：不能象林彪那样，说人们只想柴米油盐——越穷越革命嘛！

就这样“革”了两个月。剧本大修了一遍，正传阅。寄出一封信给洁清，口袋里净剩人民币一元九角二分。几天后，我的肚皮将首先进入最革命的境界！

我一想，稍微感到有点不大美妙。

然而第二天我却成了富翁。小石送来了三十六元六角，比我的薪金还多一元二角！他说是每天六角生活补助费，两个月的，其中一个月是三十一天。

总之又四个月过去了，剧本改了三稿。经过传阅，编辑部的领导决定“打印”。打印后的剧本，寄给县文教局五本，小学校五本，也算是汇报工作。这是八月初的事。

又过了四个月，剧本又大修一次，小修两次，又打印。厂

党委讨论了这次的“送审稿”，认为“本子不错。可以委派导演，筹建摄制组”了。

这消息是满面春风的小石带给我的。他说：“你这一年可真顺利！有位老作家，七〇年就借调来厂里，改了四年本子，还没通过。今年春天拂袖而去……你赶上好时光了。”

他指的一九七五年这一年。我以为这是我的傻人傻命。

这一天晚饭，我买了一份两角钱的、有肉的菜，吃了五两白饭，以示庆祝。饭后，华灯初上，第一次上街逛马路。感到这个城市的人都很和气。想帮别人推推车，没找到。瞅瞅有没有走不动路的老太太，而本地的老太太都很健康。再找找有没有迷路的孩子……呵，不能再这样直愣愣地东瞅西望了——警察已经在注意我。

第二天，小石给我张罗买火车票。并对我说：“可以预支百分之十五的稿费。”我说不必，因为还不知道能拍不能拍。虽然他们表示不拍也不退还预支部分，我仍谢绝了。我的师爷乃教育界元老，七十几岁还那样清白，我才四十五呵！

第三天早八点，准时，有人敲门，小石进来了。但不知何故，脸色异常！怒气、义愤、慌张、怜悯混合着在眼睛里射出来。他坐下，久久不语。半晌，他低头说：

“老南，你……精神上有点准备……”

我咧咧嘴答：“我一穷二白，乐天知命。”

大约他认为我这样描写自己，是现实主义的，所以下决心掏出一封信。“你看看。”

我接过信，匆匆看了一遍，是控告信！控告我剽窃了他的作品！署名是“余言佳”。

我真微笑一下。不由地想：这全是我的错。我活了大半

辈子，读了不少书，但对于我的同类——所谓人，确乎不甚了了。我总相信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我身上虽无多少水份，但很愿对别人“相濡以沫”，以为“爱邻人”，是一种享受。对什么人，都一见倾心，好象对多年失散的亲爹亲妈！现在看来，我的人生哲学，大约得稍微打点折扣了。

我实在笑我自己，几乎笑出声，但恐怕规定情景不对，就收敛了一下。抬头看看小石，这才发现他手中除了经常卷握的我那个剧本，还多了一本我省出版的文艺刊物。我见他摊开了剧本和那本刊物。剧本里很多地方划了红杠杠，那刊物上有一篇东西也处处划了红杠杠。他指给我看一篇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，标题是《金钥匙》。署名自然是余言佳。标题用二号黑体字，排在刊物的第一篇，足见编者的重视。

这时我听小石说：“你看看、你看看！这些……”他激动地指着两个本子划红杠杠的部分。“这象话吗？你的剧本是三年前写的，半年前就打印了！可这篇小说是本月发表的，作者竟然控告你剽窃！”

我又乐了。我说：“这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？”

小石打个唉声又说：“但是不好办！同样的控告信他已经递到了县、地区、省委宣传部！听说他老婆和中央某机关的领导是亲戚——他们大造舆论，这对我们厂压力很大。”

我不解地问：“编辑部……不是很清楚吗？”

小石道：“我说实话吧：刚才给你信看，一是编辑部同情你；二，也说明对你的信任。可叫大家明确表态，是谁抄袭谁的，那也很难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太老实了，还问‘为什么？’首先，人家有背景，来

头大。另外，听说A制片厂已经请余言佳改编他的小说，这又涉及到两个兄弟厂的关系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只好先回去，跟你们组织上讲清楚。我相信会讲清楚的。”小石又指那些红杠杠说：“你仔细看看，准备准备意见。这些地方，规定情景、人物关系，甚至一些情节，都是从你的剧本上套下来的。”

小石拿车票去了。明天下午才上车，我在这宿舍、八平方米的地方，还要熬一天一夜加半天！

此时此刻，我坐下来，好好想想所谓人生，我的人生，我的为人的弱点，那就是：大半辈子以我行我素而自足，对社会舆论向来很迟钝，充耳不闻。比如，学校里早有这种风言风语：“别看我们庙小，可藏龙卧虎。”虎，指的是校长，龙就是余言佳，最有权威的说明是：余言佳的预言，每言必中。奠定这个权威的事例，莫过于他对“九大”的预言。他曾在“九大”召开之前说：“‘九大’主要是权力再分配。”为此，他开出一份政治局委员的名单。命中率百分之八十！所以有人议论：“老余，非池中物也。今日未动，不过待时而飞耳！”

我都当了耳旁风。

三年前，我把剧本寄出之后（余和所有的人并不知此事），某天看样板电影，都得去。那天余言佳晚饭时喝多了，看完了电影大发议论，说：“人生的经验不过四个字：‘时机；阶梯’。时机对而无阶梯，不成；有了阶梯抓不住时机，也不成。隔……隔！综观今日之阶梯，根据敬爱旗手的启示，万般莫过于文艺……”

但对这些话，我都这耳朵听那耳朵冒。今日一想，对自己

好笑。好笑自己：你为什么要走进这名利场？电影剧本，在人家看来，那是块肥肉呀！当然要咬。从前，我只是个“屁”，人家不闻不问，我和这些手眼通天的人物，永无利害关系。人家按人家的想法去生活，我教我的学生。我曾梦想过：再教二十年。我最初的学生五十岁整。他们当中有的成了专家、学者、将军，我还是乐呵呵当我的“老教”，死而无憾！何况我有我的清清。她虽软弱，但很善良。在我的眼睛里：瘦弱的身体，缠一身黑布衣，端正而苍白的面孔，凄凄的笑容，这就很美。更何况还有小螺！她的小手、小脚都象妈妈。两片薄薄的小嘴唇，更象妈妈。她被我骂哭了，我又亲吻她，让孩子的泪水和辛酸的滋味，一齐流进我这孤独人的心底。过后，就是我和清清检讨，不该伤孩子的心。每一次，三个人的爱就更加深一层。

这会儿，我认真回顾，觉得我对我的同类、一切人，对社会、国家，没做过一件坏事；惟独在她娘俩面前，我很惭愧。如果我不写剧本，我们仍可过着清贫安静的生活。而那爱，却如以往一样；与日俱增……

我打定主意：快回去！快回去！至于和余言佳的事，好办。我向他说：剧本我让给你。不必署我的名。我发誓，永远不提你拿我的。将来如能拍电影，我自然也分文不取。条件只有一个：不能再诬陷我。因为我什么都能牺牲，只有清白二字我要留着，到死时……

在编辑部七、八位同志热情鼓励声中，我上了火车。两天之后到了家。

我想得太天真了。

我的结局是简单而明确的。因为回到学校不久，就赶上了

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。一年前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的风气，一扫而光。余言佳，我根本找不到，人家已被提拔到城里某文艺创作室，成了当地著名作家。我找他一次，就等于翻一次案。而我的帽子是特制的——“文贼”！

学校那只“虎”，先把我的薪金停了，实际上开除了公职。没有公职，可学校“随叫随到”：三日一小斗，五日一大斗，半月一游斗，逼我交待怎样剽窃作家余言佳同志的作品。

两月后，我的可怜的洁清就得了我上面交待的那种病。一有人在门外大声叫我，她就犯病。小螺再也不敢看电影了。

我呢？只有打柴苟延残喘。其实打柴也不坏，山里的野兽是很少主动攻击人的，还可以随意唱唱山歌。

一年后，余言佳的电影文学剧本《金钥匙》发表了。听说不久就要开拍。

此时也，“四人帮”刚刚被打倒。全国开始平反“冤假错案”。然而一查，我并没有“案”，因此也谈不上“冤假错”。更因“老剽”、“老抄”（都因时久而简化）、“文贼”之名，定矣！复职吗？校长一怕“有损本校声誉”；二，“打柴的收入并不比小学教员差。无此必要。”云云。

柴，越打越内行，从专业水平到达专家水平。故而学校很愿买我的干柴，付现钱。有一次卖柴过磅，我大着胆子把自己也称了称：不足百斤。而我从前，虽然瘦，可骨架子大，没掉下一百四十斤。我又乐了！

我一路笑着回家。在街上不敢大笑，怕又来一顶什么帽子。回到家，关上门，大笑一场。由大笑而狂笑，直到眼泪流光。

这样，我只有发昏。